

古农学专家石声汉先生事略

姜 义 安

(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

石声汉先生(1907—1971)湖南湘潭县仙女乡人,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

石声汉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生的父亲博学多艺,精于书法、诗、画、金石、篆刻等。母亲是位秀才的女儿。石先生是长子,从小受到父母的锤爱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入学前已读完了《四书》、《诗经》、《左传》,还念了不少诗词,石先生到了晚年还能背诵其中的大部分诗文。石先生对于诗、词、书法、绘画、篆刻诸事都斐然可观,受他父亲的影响是很深的。

石先生1914年(七岁)入长沙楚怡小学,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何叔衡同志作过他的级任教师。这位革命前辈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对石先生影响很大。石先生思想活跃,经常参加一些爱国的政治运动,如关于福州惨案的宣传和示威,1919年的驱逐张敬尧出湘等运动。石先生由于家境贫困,在小学六年半中,曾四次辍学。

1920年,石先生(十三岁)小学还未毕业,以插班生考进湖南长沙明德中学。在此期间他父亲又一度失业,石先生几乎又要辍学了。幸赖当时明德中学校长——湖南教育界前辈胡子靖先生和辛树帜等几位教师的帮助,介绍他给学校管理图书,免缴学费,又推荐他作家庭教师,先生就这样艰苦地维持着学习。在那几年里,石先生经常是晚上和他三个弟弟围着一盏黯淡的油灯做功课,当弟弟们睡觉了,他还坚持学习到深夜。学习几何需要绘图仪器,他无钱购买,就向同学借用。每借一次要替同学画一张图,因而他经常要绘两张图,先让那位仪器的主人挑选,剩下的才署上自己的名去缴卷。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在中学阶段,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对生物学和化学尤感兴趣;对英文也很入迷,曾阅读过狄更生·萨克雷、雪莱、拜伦等人的英文原本小说和诗歌;他又从国文教师刘永济先生(故武汉大学教授)学会了填词。石先生以后选定的专业虽然属于自然科学,但他对语言、文学等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1924年,石先生(十七岁)在长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但家庭无力供他上学。当时湖南教育司司长李剑农先生看到了他的试卷,又了解到他学习的成绩和经济状况,主动为石先生筹集了一笔钱,帮助他解决了治装,旅费和生活费。并写信介绍石先生到距离师范学校不远的“湖南旅鄂小学”(现在武昌先贤街学校校址)兼课,以补助生活费之不足。刚进大学时,石先生在同学中年令最小,很受器重,不少同学以后成为他终身的挚友,像吴印禅(故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赵佩莹(故广西大学化学系教授)、毛路真(故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等。

1925年五卅惨案时，他在汉口英租界曾因散发传单被英国“巡捕”拘捕过。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石先生竟被以“思想空幻，态度灰色”开除学籍。这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他回到家里后，除了读书外，还常为当地的报纸副刊写些短篇小说，并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著名作品《企屈拉》(chitra)。

1927年下半年，石先生经辛树帜先生(当时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介绍，任中山大学助理员，同时补修生物系未修完的功课。1928年提升为助教，并参加了辛树帜先生主持的瑶山生物采集队，深入瑶山数月，除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兼理队中一切函牍杂事外，晚上还在暗淡的石油灯下搜集瑶歌(共二百首，用罗马字母英文的拼音法标音)。在三个月的考察中，共写了八万余字的《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生动具体地介绍了瑶山的自然面貌，瑶民的生活、采集队每天活动收获和所感受的困苦，并对改良采集方法和应注意事项等都有具体论述，文词明净、流利、质朴、优美。石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到1931年。其间于1929年因病，曾先后在广西桂林、梧州等地休养，并在广西第二师范(桂林)和第二中学(梧州)任兼课教师。石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学会了拉丁文，并研究了语言学(PHOKOI Ogr)和《广韵》等；先后出版了《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瑶山采集记》、《广西瑶山哺乳类报告》、《广西瑶山采集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三集、《中国兽学丛书》第一集、第三集、《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报告》、《续记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湘南之哺乳类》、《瑶歌》……等十余种著述，近百万字。

1931年，石先生(二十四岁)到杭州担任浙江大学讲师。

1932年，石先生(二十五岁)到南京前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同年，和许慕贞女士结婚。

1933年，石先生(二十六岁)，考取了第一届中英庚款董事会留英公费生。到伦敦大学的帝国理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作研究生。1936年四月伦敦大学授予石先生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及帝国理工学院学侣的荣誉证书。同年五月赴德国疗养。

1936年，石先生(二十九岁)，在德国疗养不久即经西伯利亚回到祖国。一到南京，许多著名大学请他任教，他都谢绝了，最后选择到刚刚成立的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前身)任教。1938年初，石先生回到了湖南。后应同济大学聘请任理学院生物系教授兼主任(校址在广西八步)。

1941年，石先生(三十四岁)，任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生物系教授，连续任教十年。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要讲授植物生理学，同时讲授过动物生理学、德文课等。他所任教的课程，教学大纲、教材及实验课的准备与指导，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任务十分繁重，但仍挤出时间从事编写和译述。他翻译了《比较生物化学引论》，还撰写了三十多万字的《生命新观》，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诗词。

1951年春，石先生(四十四岁)调西北农学院工作，从此，石先生把他的后半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

石先生来西农后，担任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及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教研组领导工作。以后又讲授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等课程。1959年起招收植物生理学及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生，连续招收了三届共六名。同时，还接收培养外校进修教师。石先生为了搞好教学工作，编写了《植物生理学讲义》、《有机化学讲义》《生物化学讲义》及《实验讲义》等。石先生虽已执教多年，但对每一堂课，都认真准备，反复推敲，经常工作到深夜。由于他讲课取材丰富，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

石先生对教研组的科研方向，始终坚持应以水分生理的研究为主，他认为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之一。他的研究生的课题都是水分生理的研究，这是很有远见的。

在1950到1955年的五年间，石先生编写出版了《微生物和食物》，《生命和水》、《食物制造原理》等。翻译了《物理化学与液体化学》、《动态生物化学》等书。

1955年，农业部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任务，经辛树帜院长推荐，农业部委托石声汉教授等进行《齐民要术》的校注工作。石先生愉快地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在紧张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开始了《齐民要术》的校释工作，历时三年完成了九十七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齐民要术》系南北朝时北魏贾思勰所著，是一部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科学巨著，系统总结了我国公元六世纪前传统农业的丰富经验。但由于产生年代较早，文词古奥，其中所引古书奇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加上历代传抄传刻，混进了不少错字，后世皆视为难读。《齐民要术今释》的出版，为我们今天阅读它，排除了一大障碍。该书在国外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农业科学史专家西山武一教授等人，收到《齐民要术今释》第一、二册后，立即来信表示祝贺，叹服校注严谨，并表示要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齐民要术》的校译工作，以待石先生的《齐民要术今释》第三、四册出版后再继续进行。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也热情的称赞说：“我们的《中国科技史·农业卷》，极大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功劳。”

继《齐民要术今释》出版之后，石先生又先后完成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探索齐民要术中的生物学知识》、《齐民要术概论》、《齐民要术选读本》等著作，在研究《齐民要术》时，石先生还从中辑佚出久已失散的《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写成了《汜胜之书今释》和《四民月令校注》，丰富了我国古农书的内容。在《齐民要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石先生又制订了一个系统全面整理古农书的宏大规划，编制了《农书系统图》和《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的演进表》，这是石先生多年来研究古农学经验的总结，它概括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农业的记载和农书内容演变的源流。

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干扰，1958—1961年间，古农学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当时石先生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1962年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和高教部负责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西北农学院的古农学研究工作又恢复了。石先生立即着手《农政全书》的校注工作，《农政全书》是明末杰出的农学家徐光启所编写的我国又一部古代农学巨著，是对我国十七世

纪前农业遗产的系统总汇。石先生以多年研究农业遗产的丰富经验,对《农政全书》从校、注、案、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理。到1965年完成了约一百三十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初稿。在此期间,石先生还相继撰写了许多研究论文及专著,如《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校》、《农桑辑要校注》等。

1966年,当石先生满怀丰收的喜悦,正在逐步实现他的宏大研究规划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不言而喻,石先生和他的古农学研究工作首当其冲,石先生身心倍受摧残,其状惨不忍睹,但即使遇到这样的空前浩劫,石先生却坚信搞古农学没有错,他在1967年7月的一首诗中写道:“终不悔,铸错任千万……天荆地棘从容步,铜筋铁骨耐创伤。”铿锵有力,坚贞不屈。当时他的研究室和私人书籍全部被查封了,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在住室里找到了一部《焦氏易林》,这是一部讲音韵的书,石先生如获至宝,白天劳动,晚上又偷偷摸摸地研究起来,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研究笔记。今天,每当我翻阅那一页页写满恭正蝇头小楷的稿纸时,不禁热泪滚滚,先生在苦难的岁月里,昏暗的灯光下,他那伏在案前瘦弱的身影,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的精神寄托,都闪烁着他那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崇高思想的光彩。

1971年,石先生(六十四岁)因病住进了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胰腺癌,但已进入了晚期。在病榻上,剧烈的痛疼使石先生的脸上冒出豆粒般的汗珠,他从不呻吟一声,就在那弥留之际仍然惦念着工作。神志稍清醒时,石先生向他的亲属说:“希望动手术后再有二、三年的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早日出版,再计划搞二部农书。”他还告诫在农场工作的小儿子说:“你要多读些书,别乱种田,我们祖先就很讲究种田的方法,不要到了今天,反而乱种起来。”当党组织派人来探望石先生,并问及过去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时,石先生用微弱颤动的声音回答说:“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是石先生的临终遗言。

石先生不幸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终身依恋的祖国农业遗产的科学园地。但是,我们可以告慰石先生的是,在打倒了“四人帮”,清除了“左”的思想干扰后,石先生的遗稿《农政全书校注》经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后已经出版,并荣获农业部颁发的科技成果二等奖,石先生的其他遗稿亦已陆续出版。石先生用毕生心血灌溉的研究成果,将在祖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